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工农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工农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三卷 工农革命

主 编：张 皓 蒋凤国

副主编：黄少群 刘少军

编 者：金薇薇 郑玉涛 刘皓月 陈学忠 杨 华
刘 莎 姜雪松 姜 宏 王帮阁 段德春
徐 行 徐文长 袁 冰 袁忠才 贾 刚
董一臻 贾泽贵 高 强 高 波 柳 辉
唐启燕 郭庆辉 郭忠军 郭景龙 郭德宏
萧 龙 萧朝东 黄 石 黄喜兵 黄宗斌
黄仲红 黄 明 曹克然 曹 霞 曹学繁
崔云飞 章兴超 康志强 康 健 阎师承
蒋建鸿 董兰英 梁思浩 崔 巍 张文刚
戚 峰 穆春叶

统 稿：黄少群 刘少军

目 录

第一章 八七会议正式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	(001)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再思考	(006)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政策的转变	(012)
九江会议确定武装反抗的行动方针	(01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026)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031)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038)
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	(045)
全国各地武装斗争的相继爆发	(051)
“左”倾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055)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历史意义	(061)

第二章 湘赣苏区创立与各根据地的建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064)
三打永新城和四次反“进剿”	(070)
击退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	(076)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	(081)
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	(087)
柏露会议确定向赣南和闽西进军	(093)
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100)
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106)
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争论	(112)
打破国民党队闽西根据地的三省“会剿”	(119)
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提出	(124)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	(130)
红军的壮大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	(137)

第三章 中共六大召开和白区工作恢复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43)
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49)
共产党内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154)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和纠正	(158)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166)
富田事变的缘由	(173)
赣南会议改变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80)
反“罗明路线”与所谓反“邓、毛、谢、古”斗争	(185)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192)
连续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199)

第四章 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诱敌深入 龙岗大捷 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	(207)
集中兵力 运动中歼敌 红军打破第二次“围剿”	(212)
避敌主力 打其虚弱 红军打破第三次“围剿”	(217)
湘鄂西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221)
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225)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231)
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初步形成	(23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241)
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246)
撤围南丰 黄陂大捷 打破第四次“围剿”	(251)
川陕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与反“围剿”的胜利	(255)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60)

第五章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大转移

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266)
红七军团——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271)
红十军团的建立与孤军奋战	(276)
红六军团西征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280)
红二十五军——第二支抗日先遣队	(285)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290)
巧妙周旋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钢铁封锁线	(293)
血染湘江 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299)
通道紧急会议改向贵州前进	(301)
黎平会议确定红军战略转移方向	(304)
猴场会议决定加强对军委的领导	(308)

第六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继续长征

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召开	(311)
大规模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河	(318)
南渡乌江引滇军至贵阳	(325)
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主动权	(331)
纠正消极情绪的“会理会议”	(339)
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346)
强渡大渡河	(356)
飞夺泸定桥	(362)
跨过草地 翻越雪山	(367)

第七章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 巩固西北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378)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382)
北上与南下之争	(387)
南下失败 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389)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结束长征	(398)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403)

直罗镇大胜 巩固陕甘根据地	(406)
红一方面军东征	(410)
红一方面军西征	(416)
甘孜会师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422)
红军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	(427)

第八章 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遭受挫折与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制定和下达	(431)
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渡黄河	(434)
一条山激战与《平（潘）大（靖）古（浪）凉（州）战役 计划》	(437)
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440)
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 在狭窄地带一线摆开	(443)
西安事变爆发后 西路军奉命东进	(446)
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西进	(448)
西路军又奉命在临高建立根据地	(449)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452)
中央分局与留守部队逐步转向游击战争	(455)
项英陈毅领导艰苦斗争	(461)
游击勇士终成抗日先锋	(463)

第九章 九一八事变与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

日本策划侵华阴谋	(464)
九·一八事变爆发	(470)
蒋介石积极剿共 坐视东北三省沦陷	(477)
中共发表宣言 号召积极抗日	(484)
伪政权建立 溥仪屈驾执政	(49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	(496)
东北各省建立抗日义勇军	(503)
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体	(509)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运动的领导	(515)

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与初期抗日运动	(522)
-----------------------	-------

第十章 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与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怒潮	(529)
中国共产党发出各种文件号召抗日	(535)
中共号召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540)
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544)
《抗日救国宣言》推动反蒋新高潮	(548)
十项军事战略方针提出	(552)
抗日战争的基本原则	(558)
打通苏联巩固发展苏区的三个步骤	(564)
瓦窑堡会议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	(569)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形式	(575)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581)
用“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	(586)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592)
中共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继续抗日救亡运动	(598)

第十一章 一二·九运动爆发与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兴起

“华北事变”《何梅协定》	(604)
一二·九运动爆发 各界人士声援	(611)
“一二·一六”大游行 各地学生纷纷声援	(618)
各地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626)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633)
刘少奇前往华北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638)
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恢复整顿各地党组织	(646)
学联和“民先队”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热潮	(651)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三位一体”抗日局面的形成	(658)
西安事变	(662)

西安事变后国内外的反应	(667)
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673)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反遭扣留 各方纷纷准备营救	(678)
努力推动国共双方合作抗日	(68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685)
苏区和白区两个会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抗日做准备	(689)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

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和“分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原因上来讲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势力强大，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及国际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期而导致的；主观上来说，由于当时共产党尚且处于幼年期，而且群众普遍革命理论实践水平不高，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以及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指导也存在着一定的失误。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此时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对于共产党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来说，都是前所未遇的难题。

首先，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阵营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显著变化。“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①。

国民党南京政权成立后，对内实行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新旧军阀混战，对工农阶级的压迫愈演愈烈。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以买办资产

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蒋介石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许多都是地主出身，而更多的官吏更是成为了新兴的地主。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各派系、新旧军阀间斗争不断。全国各个派系的军阀都凭着自己掌握的军队争权夺利。尤其是蒋、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几大派系之间矛盾更为突出。1927年7月以后，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晋系军阀阎锡山割据山西，冯玉祥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奉系军阀张作霖仍占据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集中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军阀之间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暂时联合，同样原因又相互大打出手。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②事实正是如此，当四派联合攻下北京、天津，打垮奉系军阀之后，接连发生了蒋冯、蒋桂、蒋与阎冯之间的大战，连年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实际上变成了代表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不再致力于同共产党结成同盟，结束中国军阀内乱的局面，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除掉共产党上面，妄图将国民党树立成为中国唯一执政党，进而独掌政权。早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表示抗议，主张掌握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罗亦农等联合给中央写信，提出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应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召集因“马日事变”而被迫出走的湖南同志开会时，毛泽东就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要求解散工农武装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从后来的革命实践也可看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以保存革命力量的路线，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的。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多次提出，党要整军经武，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武装工农兵集中工农武装，以



使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这些观点反映了紧急形势下，党内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新认识。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时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政府建立后，他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并发起一场同国外列强“改定新约”的运动，采取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这实际上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了。这一切都说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转到反革命的阵营中去，共产党不应对其继续抱有依靠和联合革命的幻想。对待国民党的反革命屠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去反抗。

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软弱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寄希望于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有个别人物在南京政府内部任职，但只是点缀并未掌握党政实权。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因此随着国民党真面目的逐渐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不满与日俱增，为日后同国民党的决裂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部分软弱分子已经不能够继续作为革命力量留在革命阵营中，反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中只有少数坚定革命信念的小资产阶级继续坚持革命，并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刻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其次，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国民党一方面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消灭异己；与此同时，又通过建立和运用各种反动法律条文、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不断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此时，反革命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各地工会、农会、妇女、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和进步团体被解散和取缔；人民的革命活动被镇压，民主权利被剥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共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更是最大的犯罪。”^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骨干、群众领袖、学生代表，以及党外革命人士被关押，甚

至被屠杀，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罗亦农等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英勇牺牲。

在反动势力的摧残下，工人阶级的罢工逐年减少，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进攻的性质转到防御的性质。各地革命工会和农会等组织被查禁，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34万余工人参加的47次罢工，但是只有少数几次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县区，虽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在残酷的革命局面下，党内部分人在政治倾向、思想意识上陷入混乱甚至退缩的状态，严重的消极情绪弥漫于党内。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悲观分子，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定信念继续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正是在此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如年逾半百的资深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叶剑英等，都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紧急时刻，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革命的倾向，并提出制定武装行动纲领的正确主张。当面对夏斗寅、杨森反共，带领叛军讨伐武汉政府时，蔡和森、李立三即提议以暴动对付暴动，认为如果武汉部队、冯玉祥部队同蒋介石部队共同北伐，那么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共产党之日，我们只有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大声疾呼：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即刻检查自己的实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斗争中积蓄力量。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纷纷



起来要求拥有土地的时候，右倾错误主义者压制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抹煞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因此，大革命失败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挽救、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希望之所在。

总之，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光辉旗帜。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④许多共产党人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信念。大革命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内部就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党的前进方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是当时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唯一选择，这就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政策转变做好了思想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联合，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激化。所以中国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深厚，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⑤

注释：

①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第937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76~77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再思考

国民革命的前中期，在共产国际的方针指导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并出师北伐。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共产国际对农民和土地问题、对待国民党态度以及军事问题方面制订了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形式的决定，促使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土地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武装斗争的对象方式产生深入思考，并酝酿着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

共产国际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一味依靠国民党搞革命，因此对共产党下达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保持国共联盟，把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转向党务工作和政府工作方面，即使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应仅做政治工作，甚至把共产党力量从军队中撤出来，完全放弃了武装。共产国际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共产党制定的有关革命的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国共合作的初期，共产国际已看到国民党右派反共、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害，提出了打击右派，扩大左派，团结中派的策略。由于错把蒋介石看作是可以“左转”的、可依靠的中派，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待蒋介石的态度是以团结拉拢为主。为维护统一战线，孤立右派的反共倾向，共产国际提出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某些让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这实际上是向实权派即蒋介石让步。知道北伐前，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仍是不惜向新老右派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在国民党内只联合不斗争，来维护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团结”和“统一”。

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发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革命的倾向，提出应“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①并发出通告向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发起反击。而且第一次东征之后，中共中央也看到蒋介石动摇的一面，他畏惧民众运动并对共产党加以限制。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与



陈延年、鲍罗廷提出应该“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结果在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下，形成了右派势力扩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经过中山舰事变，整理党务案之后，共产国际还是毫无警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向国民党右派、中派作出重大让步。甚至北伐时，当加仑向张国焘问及对待蒋介石的政策时，张国焘提出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直到国民党三大前，共产党对待蒋介石的方针还是不明朗的，更谈不上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再攻击了，这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长了其地位的提高。

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共产国际便积极帮助国民党开办军事学校，训练军队并资助大量武器弹药，以扩大国民党影响。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关注还集中在巩固国民军上面，虽然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道路”^②，但这里的武装力量指的是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作的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提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③他这里提到的革命军队是指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要求共产党建立自己掌握的武装，仅要求共产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学习研究军事。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虽然提出军事问题，看到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认为共产党不必另外组建工农武装，有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就够了，共产党只需在其中加强政治工作。由于没有掌握武装，在面对国内外敌人联合进攻的情况下，共产党面临覆灭的危险。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国民革命的前中期，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中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和群众运动。然而，在国民党新老右派残酷进攻情况下，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拉拢军阀部队。共产党也初步意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把工人纠察队看作反帝先锋，提出要武装工人阶级。1926年7月12日至18日，第四届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

的决议。虽然决议提出党要通过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提掌握军队的任务，仍把注意力放在组织群众运动上面。

中国革命应向着土地革命的方向发展，这一革命任务最早也是由共产国际根据在各国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共产党指出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的斗争方向。1926年3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指出，中国革命应向着土地革命的方向发展，为了真正的推进革命的胜利，必须唤起全体农民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中去，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是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命运攸关的基本问题”^④，“农民问题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⑤《提纲》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土地纲领，即没收大面积的私有土地，制定土地革命策略应根据各地经济政治特点。同时把农民所理解的切身政治经济要求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军阀和封建官吏等中国革命共同的敌人。但对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和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国际没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要求共产党依靠广州国民政府贯彻土地革命措施，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革命。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依靠手中的权力，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发展个人势力。此时帝国主义为了破坏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武力威胁，同时英美日等方面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拉拢，企图分化革命阵营。1927年3月，蒋介石由江西东下，沿途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革命事件，如，三六事件、九江惨案、三·二三事件等。这些事实都表明蒋介石已开始与帝国主义合谋反共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趋势也有所觉察，曾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加强军队工作、大力武装工农、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以挽救革命、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但这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还不打算同国民党右派决裂，仍只停留于孤立、揭露和利用右派的政策，即使决裂在所难免，仍希望利用蒋介石进行北伐，试图拉住蒋介石。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开始实施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秘密下达“清党”命令，4月12日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深知武力的重要性，蒋介石首先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这次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公开的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他在表面